

河源与客家源流

司雁人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源与客家源流 / 司雁人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 - 7 - 210 - 11459 - 8

I. ①河… II. ①司… III. ①客家人 - 民族历史 - 研究 - 河源市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54978 号

河源与客家源流

司雁人 著

责任编辑:胡滨

封面设计:小尉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565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 jxp-ph. com

E - mail: jxp-ph@tom. com web@ jxp-ph. com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35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11459 - 8

赣版权登字—01—2019—3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56.00 元

承印厂: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前 言

客家研究建构了客家史及客家文化。文化建构鼎立了一个在深重苦难中形成独特魅力的民系。

在今天的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民系像客家民系那样,有一个世界性的民间社团组织,并定期举行世界性的恳亲活动,用自己的方言,交流乡情乡谊,追溯民系历史,颂扬前贤时哲。

赣南、闽西、粤东在客家民系形成期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正如佗城镇府门前母子石狮所象征,客家乃中华母亲怀抱里的一只幼狮,这只幼狮已经成年,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1994年,梅州,第十二届。

2000年,龙岩,第十六届。

2004年,赣州,第十九届。

2010年,河源,第二十三届。

“客家大本营”城市形象:

20世纪80年代后,梅州首先发现了自己“世界客都”的江湖地位,闽西继而发现了自己“客家祖地”的历史地位,赣南从而醒悟了自己“客家摇篮”的初始地位。河源于是也有“客家古邑”之形象定位。“客家”给四地带来了质的飞跃:提升了知名度,改善了基础设施,增强了文化自信心。

无论怎样定义客家属地、客家人,客家源流研究都避不开河源这一地域。因为龙川首任县令赵佗是秦汉时期中原南下第一人,唐代循州进士韦昌明的《越井记》是最早记载中原人与当地越人杂处的文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版《永安县次志》是最早使用“客家”称谓的地方志;最早记载客家话两种音调来源的是乾隆版《长宁县志》,长宁未立县前长时间隶属河源;嘉庆年间和平县进士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是最早研究客家的著作;原河源县回龙区客家乡是最早以“客家”命名的村庄,客家乡的“客家水”是最早以“客家”命名的一条河流,这就使河源与客家源流成为客家研究所必须。这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意义。

目 录

前言 _____ 1

绪论 _____ 1

引言 _____ 3

客家研究与族谱 _____ 7

隋唐至清:税与避税 _____ 13

陈支平:明清赋役制度 _____ 19

客家与客家先民 _____ 23

河源客家与河源客家研究 _____ 27

河源客家统计数据 _____ 29

河源客家研究文献 _____ 35

尉佗创化辟荆榛——读赵佗《上文帝书》 _____ 40

中县之民龙四家——读韦昌明《越井记》 _____ 46

徐旭曾北游十年——读《梅花阁吟·北游稿》 _____ 49

客家之子赞客家——读徐旭曾《丰湖杂记》 _____ 54

“客家”之称发源地 _____ 61

客家认知“倒三浪”论 _____ 73

粤东客家与广东客家研究 _____ 75

闽西客家与福建客家研究	86
赣南客家与江西客家研究	101
几部重要作品	108
客家大本营	123
客家大本营之形成	125
王阳明之于客家	141
走进深山访客家	162
客家之民性	193
客家之语言	207
结语	243
主要参考书目	245

绪 论

客家研究首先要解决三大问题：“客家”之称是怎么来的？客家话是怎么产生的？客家妇女为什么不缠足？

对于客家人的大迁徙，以往只注重由异族入侵导致战乱的外在力量迫使的研究，而较少甚至根本没有从王朝体制内部寻找原因的分析。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是由它本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引起的。

肇庆学院内部使用

引言

客家研究首先要解决三大问题：“客家”之称是怎么来的？客家话是怎么产生的？客家妇女为什么不缠足？

谢重光指出，由于客家源流问题涉及的时间长、空间大，更由于有关的文献记载缺少或散漫、零星，加之有些研究者研究客家源流问题时或多或少渗入了种族主义、主观主义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所以以往诸家关于客家源流的解释，迄今未获得令众人满意的结果，甚至对于什么是“客家”，以及应如何认识谱牒资料的价值与局限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也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往的研究，都还没有给“客家”一个准确的界说，甚至跳开“客家”一词的产生，而直接大谈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客家精神。这就常常让人觉得，似乎有人想把客家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分离出去，客家研究这门“显学”难免有沦为“险学”的危险（周建新语）。

“客家”之称内涵不清、来由未明，客家研究因此成为一种概念未定而永无休止的判断、推理，甚至不着边际的臆想（自我优越）。客家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分布》，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有学者担心，由于本身没有很扎实的论据，不少论者仅仅依据一时一地的材料而作以偏概全式的研究，或者从自己生活的地域出发对其他地区进行种种臆

测推想,故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目前的客家学研究中又被当作“一家之说”不时征引,以致越来越玄虚。

笔者采用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钩稽分析的方法,结合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部分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长期从事河源客家及客家大本营研究,本书主要讨论如下问题:

一、发现并证明“客家”之称发源地及其历史地位和逻辑地位。

二、提出并证明客家“逋赋避役说”。

三、区分并证明“创话客”与“受话客”。

四、论证徐旭曾考察之中原即京杭大运河冀鲁苏段附近地域,并进一步论证客家初民来自中原腹地大运河附近冀鲁苏豫皖交界地域。

五、论证客家语言以粤闽赣山区畚族妇女为母体,以冀鲁苏豫皖交界地域北方汉人为父本,并给出客家方言创生境况的具体描述。

六、区分客家与客家先民。

——“客家”之称发源于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交汇的冲要之地——河源。找到了“客家”之称发源地这个历史基点,就找到了整个客家研究的逻辑支点,有关客家的研究就能避免一些笼统的、没有针对性的、不够客观的叙说,客家文化系列研究就可以有序地列队,客家学就能够建立起缜密的学科理论。

——跳出“战乱南迁说”的窠臼,走进大山中的历史现场,深入了解大山中民众的生存状况,从历史上官民关系对立的一面分析原因,提出更切实际的“逋赋避役说”。认为若没有“逋赋避役”的原因,哪里的百姓也不会进入瘴气肆虐、人迹罕至的粤闽赣边区深山老林。

——厘清“创造客家话的客家人”与“接受客家话的客家人”之区分,从而清除了客家叙事中的所有障碍。

——以徐旭曾“视察河工”为出发点,结合实地考察,确定客家初民来自中原腹地大运河冀鲁苏段附近地域。

——北方汉人教导畚民主妇说汉语,从而形成了客家话(阿姆话)。

——王阳明之后的客家,才逐渐成为现代意义的客家,而之前的客家,则属

客家先民。

陈槌《罗浮志》卷三《山中木客》：“东坡诗云‘木客馈山飧’，又云‘山中惟木客’，盖屡用木客事。按徐铉小说载，鄱阳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时造宫采木逃于山中，食木食，遂得不死。时就民饮酒，为一诗篇曰：‘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罗浮必有此族也。”该志卷八徐心远代作《登山论》亦有“木客长啸，彩禽来集”句。直到清朝乾嘉年间，罗浮山信客赵希璜、徐旭曾，其诗文里都提到“木客”一词。

地处赣闽粤湘边的客家大本营，山连着山，称“山都”。以伐木为生曰“木客”，以耕耨为生曰“耨客”。赵希璜乾隆四十七年（1782）《研榘斋（并记）》“山魃木客彻夜喧豗”，显然把自己和“木客”分作两类。徐旭曾乾隆四十五年（1780）《小罗浮》“听木客吟诗”之“木客”，也不包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读书的仕宦人家。徐在《丰湖杂记》里美谈“客”时，当然就包括了自己。《丰湖杂记》含了“客家”内容及意义，但没有给出清晰的“客家”概念。罗香林之“客”并不是客家。只有康熙永安县志“民多贫，散佚逋赋，名曰客家”，描绘了客家的本质特征，给出了客家的准确定义。爬梳文献、田野作业都能够证明这个定义可以确立。房学嘉以“山客”为客家应该说抓住了客家民系的本质所在。

对于客家人的大迁徙，以往只注重由异族入侵导致战乱的外在力量迫使的研究，而较少甚至根本没有从王朝体制内部寻找原因的分析。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是由它本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引起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客家研究之所以到现在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因为我们以往只是一味简单地从“客家大迁徙”这一事物外部去寻找原因，所以无法说明同样是移民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相互转化，无法确认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书着重于建构自己的理论，而非解构已有成说。不否定“战乱南迁说”，但另提“逋赋避役说”。

战乱过后，政府都是号召流亡者回归本土。明初，朱元璋恢复发展生产措施

之一,就是号召以往离家出走的人员回家,各归田里,不论其过去出走出于何种原因,一律不予追究。如果回家后,无地或少地者,政府按其人丁多少,拨给附近荒地。民众中“田园将芜胡不归”也是主流思想,“他乡拓殖”则是末流意识。前途未卜、当地人欺生是常态,没有哪个地方会张开双臂欢迎外来者,大批外来者进入,定会引发当地人莫名的恐惧甚至抵御。

调查发现,生命个体进入深山老林,生存肯定是第一原因。客家迁徙首先是政治原因——反抗官府,逃避税役——甚至杀死杀伤税吏,被迫逃亡。朝代更替,相当多是农民起义推动的,而农民起义大多与当时税负沉重有关。两千多年来,一批又一批起义军高喊着抗捐抗税的口号唤起民众以赢得百姓拥护。王朝强权统治下,能够“逋赋避役”的人总是个案的、少数的、分散的,向来不入官方记载的,而成功“逋赋避役”的客家人在官府管理相对薄弱的粤闽赣山区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族群。

“逋赋避役说”把客家南迁粤闽赣山区,与“闯关东”“走西口”等为获得更多耕地资源或“淘金”机会的迁徙区别开来。

王阳明行“十家牌法”、举“乡约”、兴“社学”三者结合教化民众的治理模式,在“重构社会结构和重塑个人性格的习性”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达到重塑南赣地区社会和个人‘习性’之功效”,“习性改变最终使南赣地区由‘盗藪’转变为‘文物衣冠’之邦”(陆自荣、徐凤仙《习性与秩序:王阳明南赣社区治理模式及意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河源位于东江上游山文化、下游三角洲冲积平原文化及粤东潮汕文化结合的三位一体的中游惠府文化圈。“客家”之称产生于河源这个客家地区与广府地区结合部,包含了土客冲突(或称先主与后客冲突)的含义。

罗香林的研究用了客家姓氏28种,陈支平的研究用了56种,本书则用了109姓237支(未含后补《紫金冼氏》),且基本集中在河源一县范围内,并尽可能地穷尽了这个古县现存所有客家姓氏宗支(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河源县姓氏82个,其中单姓81个,复姓1个)。

对一个始建于齐永明三年(483)的古县的所有居民——厚实证,薄传闻,逐

姓逐支一一进行实地调查。然后提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冀得“麻雀”功效,以期一县而至于两县三县,两三县而至于各县之普遍性意义。

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人,至今鲜活而生动。人们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拜山拜水拜自然,敬天敬地敬祖宗。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居于集市,也可以选择住在农村。而我们现在散处于城市各个角落,散得连一部族谱都续不起来,亲族视同路人。

陶醉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人们,是否想到农村的消解。消解了中国农村,就消解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消解了,我们的心就被掏空了,我们的根就被拔起来了——这种显而易见就在眼前的后果,让我们惊恐万分不寒而栗。

我们对自己“打造”的能力也过分自信,我们打碎的往往是经过历史淘洗沉淀下来的核心价值和价值核心,造出来的常常是暴风骤雨过后的满目疮痍。

本书只想作“窄而深”的狭义研究,只想研究“客家”这个说法、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少主观推断,重史实确认和论据结实。

客家人写客家,未免陷于自我优越。今笔者写客家,就事论事,不偏不党。

客家研究与族谱

中国的“姓”,发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生为“姓”,意即是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的,起着“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氏”则为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会,“氏以别贵贱”。进入阶级社会后,氏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而贵族女子仍称姓。《通志·氏族略序》:“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氏同姓不同,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婚姻不可通。”

春秋以前,只有“百姓”以上的统治阶级才有姓,平民百姓没有姓,因此姓很少,只有姬、嬴、姜、姒、姚、妫等十数姓,且都是女字旁。迨至战国期间,平民才开

始有姓,姓氏也逐渐混同。两汉时代,姓氏合一,通称为姓,延续至今。

我国姓氏以封国封邑为多,其他来源有六,大致不出祖先之号、之字、之谥、之爵、之官名职衔及所居之地。明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姓氏的区别,或得之于祖先的封邑封国,如黄、陈、刘、吴;或得之于祖先的号,如轩辕氏、高阳氏、葛天氏;或得之于祖先的谥,如文、武、照、景、成、戴;或得之于祖先的爵号,如王、侯、王孙、公孙;或得之于祖先的名或职,如司马、司徒、司空、中行、巫、卜、陶;或得之于祖先的字,如孟孙、叔孙、子服;或得之于所居之地,如西门、西阊、南宮、南郭等。自魏晋至隋唐时,每个郡(州)的显贵家族,称为郡望(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百姓所仰望之家族),如李姓称“陇西”,黄姓称“江夏”等等。

有姓氏才有族谱。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追远者,考世系也。由身而父,由父而祖,由祖而高曾祖,而始祖,以至始祖之所自出,苟可以寻求而考之,可谓远矣。

韩昌黎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韩愈《与于襄阳书》)苏老泉言:“三代不修谱为不孝。”宋徽宗御制吴氏族谱序:“人不有谱,安知有亲未尽而已疾视如仇敌者乎?谱岂可不作,亦岂可不续作!”“谱官爵之盛不如谱诗书之泽,谱族党之富不如谱诗礼之风。”

有谱可知:我与尔初本一人之身,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如木之柯叶繁而同本也,水之支派殊而同源也。无谱:世远则服尽,服尽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不相庆吊,而视如路人矣。

人情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经流远,视若途人。谱存而宗可考,故君子重之。披图按籍,孝思勃生。

客家族群,盛行修谱。客家研究,基于族谱,所论所据皆来自家乘。

罗香林“深觉中国所谓正史与方志,其载述往往仅能及于朝政之实施,与制度之创立、地方之建置、财计之丰歉、人物之得失,及边民之入居,如是而已。而于各族姓之迁移转徙,与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则仍不能不于各姓之谱乘求之”(《中国族谱研究·绪论》,1966年就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时发表之英文讲稿,刊

登于港大《宪报》十四卷一期,《书目季刊》转载后印成单行本发行),所以“他平日治学,亦充分利用族谱,进行专业研究”(罗桂祥《罗香林教授传略》,见《兴宁文史》第十三辑,1989)。罗香林先生运用族谱资料研究家族繁衍、民系发脉的成功途径,开创了客家学研究方法的一代先河。

王东《客家学导论》:家族谱牒所反映的某一姓氏家族的血脉根基、迁徙经过、支脉分化等重要问题,对研究客家先民南迁的原因、移民规模、成分以及分布特点,具有其他材料所无法达到的功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谱牒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它是中央政权衰弱以及门阀豪族势力膨胀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九品中正制”这一政治举措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谱牒的基本观念就是门第,并由门第而生郡望,而两者最后又统一于姓氏血统。门第的高下与郡望的高低,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经济权利。故而许多人便伪造谱牒,冒充世族,以至于出现了“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的局面,从而导致了谱牒资料的严重失实。家族谱牒中关于某人政治事功及学养才德方面的记载,也多有不实之词。今天不少客家问题研究者,都持有“客家乃中原衣冠望族”之说,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的主观情感有关(这些论者大多为客家人),另一方面也显然与偏信家族谱牒的记载有关。^①

客家族谱中几乎千篇一律地记载着各姓氏各家族的老祖宗都是大官,或者博学之士,因看到朝政腐败、奸臣当道而隐居不仕。谢重光说,只要对各族谱所载其祖先的历官情况略加考察,就会发现其所载官名、地名往往与当时的职官制度、政区建制情况不合,诸多矛盾,漏洞百出,不可据信。

身为客家人的谢重光指出,以官爵科名而论,客家族谱也总要为一些祖宗安上高官显爵、进士登科之类的荣誉,其中大部分在方志中的职官题名、进士题名等资料中查无实据,甚至连职官名称都是杜撰出来的,不符合当时当地的官制。

陈支平也指出,中国族谱有着攀附名人、冒造祖先的通病,客家族谱也不例外,举凡先代重要名人,如李世民、刘邦、范仲淹、郭子仪、朱熹、杨时、游酢、韩愈、柳宗元等等,无不被客家的姓氏族谱拉去作祖先。这方面的内容本不足为据,但有些研究者确信无疑,就难免出现以讹传讹、贻笑大方的情况。许多事例都提醒

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不可不慎加鉴别。只要稍加鉴别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谱牒或与当时的封爵、职官、科举制度不合,或与一定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矛盾,或违背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生活习俗。总之,只要我们认真地把谱牒中的记载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伪托作假都有可能露出马脚,从而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

唐代时颜师古就曾言:“私谱之文,出自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②黄宗羲亦曰:“氏族之谱……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诒嗤笑。”(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淮安戴氏家谱序》)顾炎武:“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唐书》表李氏则云:纣之时有理征,字德灵,为冀隶中吴伯。不知三代时无此名字无此官爵也。表王氏则云: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传记亦无此事。”(《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相传之讹”)应该说,各姓氏族谱为塑造或建构谱系,大多有误书祖先者,除其高曾祖父基本可靠,至于汉魏先哲、先秦人物乃至神话人物之祖先追认,则大都出于捏造攀附,并不可靠。此种现象明显体现在汉末迄于唐末——中古时期,士族政治社会中名门望族的郡望表述和祖先排比大同小异,成为士族门第的名片和脸面。遍阅各姓氏族谱我们发现,所有家族都历史悠久、声望显赫、卓越优异,几乎没有人祖上出身寒微。这种没有一例能够力证代代相因血统遗传的假戏真做、一丝不苟的追祖方式,已成为整个社会风气的文化认同。

历史沧桑,变乱纷争,家谱或焚于兵火,或毁于人祸,后世修谱求于遗老逸闻,人自为说。或因“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苏洵《嘉祐集·谱例》),牵强附会,妄扯祖先。以致各宗支谱志所载共祖,其所处年代颇有出入,各自为是,诸说并存,莫衷一是。即便没有主观故意,上古世系本就含混不清,如微子众多后裔都各有所依,族谱互不能通。

郡望与堂号连在一起,彰显于堂联。堂联即贴在祠堂大门左右两侧的对联,包含郡望与祖宗业德方面的内容,起阐发堂号的作用。